

在沙漠里修筑绿色“长城”

何延忠口述 陈 颀整理



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修建了都江堰，秦人在崇山峻岭上修筑了“万里长城”，我为何不能学他们呢？

我叫何延忠，今年51岁，出生在甘肃永登县一个农民家庭。我两岁半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承担起照顾5个孩子的重担。母亲勇敢坚强，再苦也不叫苦，她勤劳、宽容和善良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9年，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劳动，担任村文书，后又任村主任、党支部。由于对冷水鱼的探索和研究，我成功地发展了当地的虹鳟鱼产业，永登也成为虹鳟鱼之乡。我也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调到永登县农牧局主管的水产站任副站长。凭着对养殖虹鳟鱼的热情和专注，我们渔场的规模不断扩大。1986年，碧波产业公司成立，主要致力于高寒冷水鱼的生产研发和应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高寒冷水鱼全产业链、生物工程和沙漠冰川冷水生态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多元化公司。我本人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2000年，敦煌市政府为保护阳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防止风沙水患对阳关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以敦煌沙漠生态旅游项目为依托招商引资。当听说我要去敦煌阳

关投资生态荒漠化治理开发项目时，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疯了才会在沙漠搞生态，贤惠善良的妻子也流着泪劝我。但我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用水虹鳟鱼实现生态治理，让沙漠变绿洲。

带着这样的梦想和激情，在2001年3月乍暖还寒时，我率领着技术专家和工作团队来到了阳关，入驻位于敦煌市阳关镇的库姆塔格沙漠，开始了人生第二次创业之路。

阳关自古就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和“丝绸之路”的必经关隘。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的“阳关”，就是指这个地方。历史上阳关镇是敦煌抗击风沙的第一道防线。在沙漠的逐年推进之下，要守住敦煌，就必须守住阳关。严酷的现实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这里除了几万亩沙漠戈壁外，水、路、电，什么设施也没有，只有满眼黄沙和一片荒凉。更为严重的是，沙丘每年以4至10米的速度向阳关逼近，2000多米长的防风林带枯死，沙尘暴猖獗。时不我待。我带着这样的信念，率领一帮人兵分几路，开始着手建冷水鱼基地。不料，老天爷接连不断地丢给我难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沙漠是缺水干旱的地方，但是，库姆塔格大沙漠却长期面临水患的严重威胁。一方面连年干旱，蒸发量是降水量的80至100倍，沙漠化日趋严重；另一方面，洪涝灾害频发，超干旱地区的敦煌一旦到了

汛期，来自肃北、阿克塞乃至本地的洪水往往带着泥沙奔流而下，轻则污染水源，重则冲毁道路、农田和村庄等，给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2006年，一场特大沙尘暴把我们的帐篷卷走，新植的几千亩树也全部被摧毁。2007年，连日大雨裹挟大量泥沙形成的泥石流，把新开挖的几十个基础鱼塘填平。2011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泥石流，把科技园这些年来培育的12万条亲本种鱼和1000多万条商品鱼全都冲走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亿元。放眼望去，一片苍凉，员工们失声痛哭。

这些沉痛的教训使我认识到，沙害、水害祸患无穷，水害比沙害更为可怕。在阳关搞生态综合治理，就要一手治水害，一手治沙害，两害兼治方能见效。我想，大环境治不好，小环境能保住吗？必须将公司的利益同阳关、敦煌的大环境结合起来。

到底如何根治水害和沙害呢？我苦苦思索，并请来了不少生态水利专家，共同寻找降服水害、沙害的办法。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忽然一个灵感在我头脑中闪现：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修建了都江堰，秦人在崇山峻岭上修筑了“万里长城”，我为何不能学他们呢？

这一发现使我兴奋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

蹈，我对员工说，修座“沙漠长城”阻击风沙，建个“沙漠都江堰”导洪疏流，我们要以“水害”治“沙害”。

专家们充分肯定了这个想法并共同进行探索。我们先是种植防护林，紧接着在沙漠中勘测洪水路线，再建分洪河道、疏流堤坝、渗透过滤净化工程，然后修筑“沙漠长城”，一步一步，最终探索形成了“分洪疏流治沙”的生态治理模式。我们搬运沙丘石山500多座，拉运石料1亿多立方米，在沙漠中开凿疏流分洪河道，修筑疏流堤坝13条90余公里，并在风口筑起20多公里“沙漠长城”，抗击沙丘的推进，将威胁阳关村庄的沙丘向后退移了近5.6公里。我们建设分洪调蓄渗滤净化工程，新增可利用水源0.6m³/s。以水害治沙害、变沙进为沙退，生态治理2.6万亩，荒漠化治理8.4万亩，黏土固沙5.4万亩。就这样，洪水好似安装了“水龙头”，沙漠则变成了“过滤器”，为保护敦煌阳关竖起了屏障。

我把30年养鱼赚的钱全部投在了阳关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上。如今，在阳关镇的最前沿库姆塔格沙漠风口，已经有了长达20多公里、宽近千米的绿色生态屏障，把向阳关移动的沙丘用生态植被死死困在了“沙漠长城”以外。大坝内外拐枣、红柳和梭梭生长茂盛，芦

苇也开始冒尖，原本被沙丘掩埋枯死的防护林又抽出了绿色枝条。随着“沙漠都江堰”生态效益的持续发挥，周边已形成生态湿地0.96万亩、生态绿化面积2.6万亩、荒漠化治理面积8.4万亩、防风固沙面积5.4万亩。“沙漠都江堰”工程实现了生存、发展与保护并重，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并举，凸显出治沙、驯洪、生态产业、富民等多重效益。

多年的辛苦终于见到成效。然而，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够的。阳关生态综合治理这项工程需要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力量支持和参与。今年夏天，以中科院程国栋院士、郑晓静院士为代表的30多位科学家专门来到阳关，对“沙漠都江堰”的科技成果进行研讨。他们认为，这个项目一方面工程浩大、设计巧妙、建成不易，另一方面，化水害为水利、化沙害变沙利的这种以“害”治“害”、化“害”为“利”的治沙治水思路，具有创造性和推广性。他们提出，“分洪疏流治沙”的生态治理模式融合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践效果十分突出。我感到非常欣慰。现在，中科院已经在我们这里设立了水文水资源环境研究中心，“沙漠都江堰”项目也已经被列入中科院“星火计划”中。

阳关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远远没有完工，还有几万亩沙漠等待我们去治理。任重道远，需要年轻一代接班继续做下去。我儿子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阳关基地，我觉得，治沙治水保护敦煌阳关后继有人了！



艺术家的灵魂是大爱

罗序伦口述 黄 鑫整理



“一种艺术，需要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大美；一个艺术家，同样需要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大爱。”

也许别人不信，但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过过苦日子，所以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总想回报社会、朋友和家人。从事书画艺术60多年来，我的梦想就是让书画给社会带来最大的价值，用书画艺术来架起一座爱心桥梁。

我1941年出生在安徽巢湖，生活在人杰地灵的徽文化艺术摇篮里，宣纸、徽墨、歙砚这些安徽著名的特产吸引我走进了书画艺术中。我最喜欢中国画，并专攻花鸟画中的梅兰竹菊。

开始我只是自己喜欢画，直到1980年，我当时在安徽省肥东县委宣传部工作，有一次我参加完一个水墨画展览后还多余了两幅宣纸，就应一个朋友的要求画了两幅画送给他。几天后，这个朋友拿了400元钱来给我，说是卖画的钱，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元，这对我来说无异于一笔飞来横财。这件事情也让我开始有了通过画画来帮助别人的念头。

最初，我拿卖画的钱去买宣纸和笔墨，送给对书画有兴趣却没有能力负担纸墨的人。因为我觉得一朵鲜花不为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满园。1983年，我当了肥东县文联书画家协会会长，利用这个职务，我不仅把书画活动从县直机关办到农村、厂矿和学校，还从中不断发掘书画人才，发现一个，追踪一个，培养一个。

1991年，肥东遭遇大水灾，我组织卖画赈灾，筹了几千元捐给龙塘中学买课桌，我又发现原来书画可以做这么多事情。从那时起，我便经常通过卖画来扶贫。

1998年，我当时在广东艺术中心任书画院院长，一天晚上从央视《焦点访谈》中看到贵州省晴隆县有3000多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决定牵头组织一个“血浓晴隆，艺术扶贫献爱心大型公益活动”。我放下了个人画展的筹备工作，开始向全国各地征集书画作品，准备举办书画义卖活动募集善款，帮助晴隆解决因困失学儿童的问题。在得到广东民政部门的支持后，我拿出了准备出个人画册的多年积蓄，裱装征集来的名家书画。这次义卖得到了广东佛山市台协会、广东南海台商联谊会的大力响应，许多台商慷慨解囊，这样，我一共筹集到了60万元善款。

2000年底，我带着一批爱心人士来到晴隆县一个偏僻山村，建起了一所拥有900平方米的教学楼、360平方米的教务楼、500平方米的操场，可容纳800名学生的希望小学。这是黔西南贫困山区的第一所希望小学，为此我投入了个人积蓄25万元。

学校落成后，当地政府希望以我的名字来命名校名，但我拒绝了，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那样命名学校就得不到发展了。我当时考虑到，建这所学校台商们出了很多钱，但学校盖好了不等于教育办好了，我还希望这些台商们今后继

续出钱维持这所希望小学的发展，为孩子们出资买书包、课本和衣服，再加上海峡两岸人民情感的需要，最终我建议学校命名为“贵州晴隆台商希望小学”。

学校开学时，我带着这些台商朋友们去剪彩，他们又给孩子们带去了衣服、书包和课本，还买了10多台电脑。那天，看着孩子们能免费上学，免费背上新书包，穿上新校服，我热泪盈眶，我觉得这就是书画的最大价值。

很多希望小学盖好了以后就没人管了，我就想着怎么能持续地把贵州晴隆台商希望小学办好。于是，我又和台商朋友们签了协议，我每年给他们至少画两幅画，他们每年给希望小学投入30万元基本运作资金。同时，我还在学校设立了各种奖学金，我给谁画了画，谁就往相应的奖学金里投入一笔画款。

2001年，我又为华夏银行深圳分行景田支行作画，倡议该行资助晴隆县办一个女童班。这年9月1日，女童班真的开班了，40名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自那以后，我又为此作画1000多幅，除了办好台商希望小学外，又陆续帮助晴隆县1341名失学儿童回到课堂。

同样是在1998年，广东遭遇洪灾，我去广州画画赈灾，其中一幅《翠竹》图赢得了印尼金光集团高达1500万元的赈灾款，我也全部捐给了抗洪救灾行动。

去年，我发起、组织的慈善中国书画院成立了。我作为院长，将继续用书画艺术来架起一座座爱心桥梁。我始终相信作画先做人，也始终坚持我的梦想，那就是艺术的最大价值，就是用它来回报社会。

一种艺术，需要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大美；一个艺术家，同样需要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大爱。大美为纬，大爱为经，组成了我的价值观。

成为瓷都的“名片”

胡 俊口述 缪绪强整理

“不仅要站稳每一班岗，执好每一次勤，还要成为瓷都的‘名片’。让世界从我们身上看到‘瓷博精神’！”

金秋10月，站在2013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现场，回想一下，从担负第一届瓷博会安保任务至今已有10个年头！10年来，我以一名“瓷博卫士”的身份，感受着陶瓷文化发展带来的变化，它正带着我们一起面向世界！

景德镇原名昌南镇，有着1700多年的制瓷历史。唐朝时期，昌南生产的精美瓷器远销世界各地，在欧洲，人们以能获得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把“昌南”的谐音“China”作为瓷器和生产瓷器的“中国”的代称。1004年，酷爱瓷器的宋真宗把年号“景德”赐给昌南，景德镇由此得名。

谈起这段景德镇人都耳熟能详的骄人历史，驻守在“千年瓷都”的我们无不感到自豪。

2004年，在景德镇诞生千年之际，首届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在世人的期待中应时而生，盛会的安保任务落在了我们武警景德镇支队身上。入伍两年的我第一次站在国际盛会的舞台上，面对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游客，紧张感随之而来。近2个多小时的开幕式活动，我绷紧了每一根神经，一动不动。当身边走过的外国友人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发出“Very good!”的赞美时，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知道，那是在夸中国武警形象好。

2005年，我幸运地考入了军校，再次与“瓷博会”重逢，已是4年之后的事了。在这4年里，商务部成为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主办单位之一，并把瓷博会作为“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振兴中国陶瓷产业”的国家重点项目，不断加大对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扶持力度。国家在集中清华、北大等全国62所高校研究开发陶瓷高新技术的同时，还不断宣传中国传统陶瓷文化，将“博览世界陶瓷精品，弘扬千年瓷都文明”作为博览会主题，使瓷博会顺利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2013年，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瓷都武警与瓷都人民都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第十届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十年磨一剑”，如今的瓷博会，在大力推动经贸合作的同时，还紧紧围绕拓展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世界陶瓷发展等项目，举办了中国高岭国际陶瓷艺术大赛展、高技术陶瓷国际论坛、首届全国旅游陶瓷创意设计大赛、宋元青白瓷展暨研讨系列活动、艺术名家书画邀请展、第六届大学生陶艺大奖赛、国际艺术陶瓷拍卖会等活动，吸引了境外800多家陶瓷企业前来参会。

面对世界各地前来观光的友人，被誉为“瓷博卫士”的我们也已不再紧张。瓷博会期间，当一位外国游客用生疏的中国话向我求助时，我可以自信地用几句简短的英语为他指路解难，让这位国外游客大吃一惊。这几年，随着瓷博会规格的不断提升，对参加瓷博会安保任务的我们要求也越来越高，官兵们不仅要思想纯洁、素质过硬，还得具备一定的英语表达能力，精心筛选备战后才能上勤。

10年来，我们透过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发展变迁，共同见证了第二故乡的飞速发展，更见证了中国特色陶瓷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深刻体会到了文化软实力的推动作用。我想，科学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会把景德镇重新带向世界陶瓷之巅，重振昔日“世界瓷都”的辉煌。而我们这些“瓷博卫士”，不仅要站稳每一班岗，执好每一次勤，还要成为瓷都的“名片”，让世界从我们身上看到‘瓷博精神’！